

隨筆·觀察

上海洋場文人的格調

● 葉曉青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上海租界出現了精英文化真空的情形，在傳統社會中扮演精英文化對平民文化控制角色的中國紳士在租界不存在，不是說作為個體，而是作為社會集團不存在，而西方租界當時對文化上控制中國人口也完全沒有興趣，因此沒有所謂文化霸權(hegemony)。儘管這種局面在二十世紀時已改變，但上海城市平民文化卻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已基本形成，為上海繁華生活或是商業社會發財機會而來的移民，既無清晰民族意識及排外心理，自然樂於接受西方物質文明。正如我在《二十一世紀》第一期已提到的，上海老百姓很快接受西式飯店，賽馬、馬戲等。上海人向來有靈活、崇尚新的特點，又因自身原有文化背景所限，這種追求新往往流於淺薄、庸俗。這種上海城市平民文化的特徵延續到二十世紀，並對上海文人發生深刻的影響。

十九世紀末上海租界也吸引了一些舊式文人(說舊式是他們有傳統文人的背景，以相對當時一些留學歸來

者)，如王韜，李善蘭，錢昕伯，何桂笙、韓子雲，李伯元等等。雖然他們彼此是朋友，有類似背景，但在那個轉折時期，卻分別走向很不同的道路。其中一類接觸了西方的精英文化(也許更確切是 learned culture 或 high culture 如科學技術)，他們從此致力於引進西方上層文化的工作，他們是二十世紀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先驅。他們代表的文化並不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租界當然為他們提供了方便。但與其說他們的事業依賴於租界這個環境，還不如說依賴於租界的某些機構，如墨海書館。這批人的興趣與平民無關。

另一類文人同樣放棄了傳統學術道路，但也並沒有轉向西學，他們開創的是一種市民的文化(柳存仁先生稱之為middle brow)^①，也就是二十世紀在文學上被稱為鴛鴦蝴蝶派的前身。這不僅僅是文學上的流派，它代表的是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介於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的趣味之間，它產生於租界，與租界日常生活環境密切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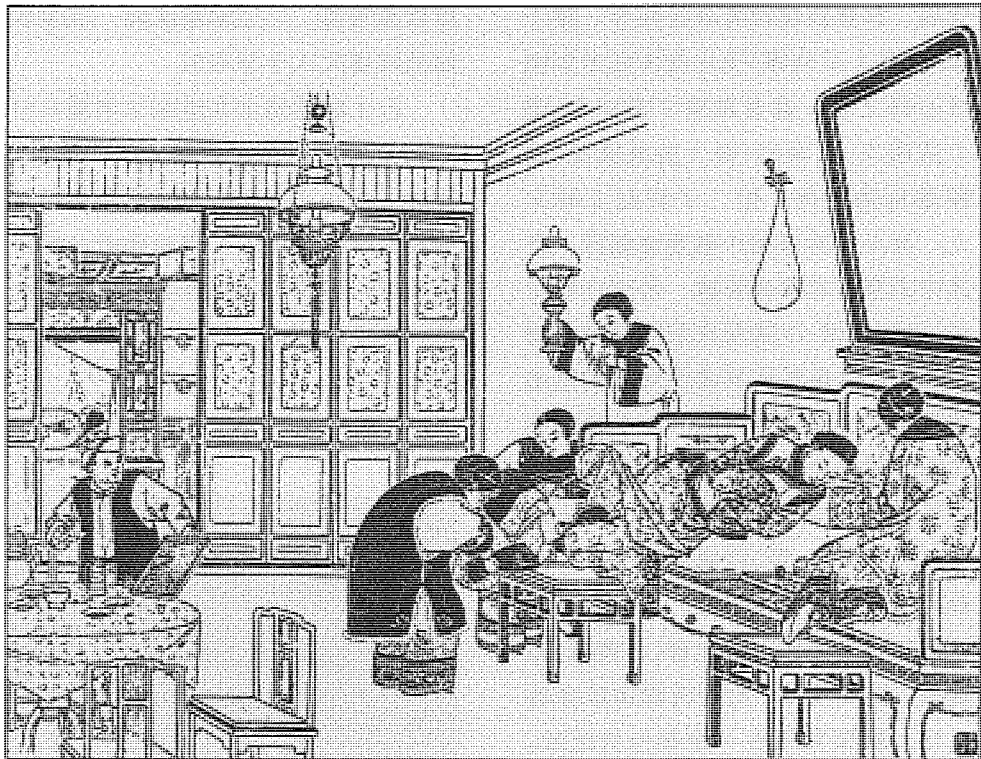


圖 當時士風日下，紳士子弟公開地挾妓同嫖，淫樂無度。

關，我以為這是文人深受城市平民文化影響的結果。它的讀者對象是城市小市民，而不是底層勞工。Perry Link認為那是因為這類作品的語言對勞工來說太難^②，其實還不僅是語言的，更是趣味的，因為這些文學描寫，表達的都是小市民的生活，而不是勞工的生活，正如在構成上海城市平民文化中最活躍的也並不是在人口數量上佔多數的勞工階層。

第二類文人雖然使用的語言基本上還是文言，或者說近乎文言的 semi-classic，但其趣味已脫離傳統士大夫的了。士大夫的詩詞、繪畫要求高雅，這些洋場文人卻寫竹枝詞詠電燈、煤氣、馬車、酒樓、茶館，甚至何桂笙第一次嚐到罐頭大馬哈魚後，在《申報》發表竹枝詞讚美其味道（1883年10月9日《申報》）毫無含蓄可言。又如出身紳士家庭、本人中過秀才的李伯元在租界辦小報，寫小說，首創為妓女開花榜之例^③。

以傳統標準來說，他所作的一切當然都不可取。1902年，清政府設經濟特科，侍郎曾慕濤舉薦李伯元進京應考，即被朝中官僚以「文字輕佻，接近優伶」所彈劾^④。洋場文人為傳統學者所不容，他們的繼承者——鴛鴦蝴蝶派也為五四學者所不容。鄭振鐸大罵洋場文人「鴛鴦蝴蝶派的大本營是在上海，他們對於文學的態度，完全是抱着遊戲態度的。……他們對於人生也是抱着這樣的遊戲態度的。他們對於國家大事乃至小小瑣故，全是以冷嘲的態度出之。他們沒有一點的热情，沒有一點的同情心，只是迎合着當時社會的一時的下流嗜好，在喋喋的閒談着，在裝小丑，說笑話，在寫着大量的黑幕小說，以及鴛鴦蝴蝶派的小說來維持他們的「花天酒地」的頹廢生活，幾有不知「人間何世」的樣子。」^⑤

其實十九世紀洋場文人並不忌諱他們的人生態度。洋場對他們本是遊

樂場，科舉無望便流連於租界。韓小雲的《海上花列傳》便是他狎妓多年後的心得之作，還有直接了當託名「滬上遊戲主人」寫的《海上遊戲圖說》這類遊玩指南的。但二十世紀上海文人，無不忌諱被稱作鴛鴦蝴蝶派，連其中主要者也沒法解脫，甚至甘願自稱「民國舊派」以避免被冠以鴛鴦蝴蝶派的^⑥。這當然與其遭受知識界其他學者的蔑視與抨擊有關。由於鴛鴦蝴蝶派並非孤立的文學流派，在捱罵時往往連着上海的社會環境，魯迅的〈上海文藝之一瞥〉抨擊洋場才子，從申報文人，包括吳友如，一直到二十世紀文人，周作人的文章〈上海氣〉乾脆稱上海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為一種上海氣，流佈到各處去，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文章也是其一。」^⑦

1930年發生的海京派文人大論戰，原因多種(可參考李俊國〈三十年代京派文學思想辨析〉^⑧)，我看很主要的一個原因是知識精英對城市平民趣味的不可容忍。有意思的是這些大罵海派文人的學者中不少便是民間文學運動的發起者如周作人、顧頡剛等。他們承認民間文學、民歌的價值^⑨。雖然他們的口號是「走向民間」，但他們認可的只是未經現代氣息或者說工業化、商業化薰陶的純樸的民間文學，而不是降低了格調的、以小市民為服務對象的「中間口味」(middle brow)，雖然小市民也是「人民」。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今天的文學評論中，仍可見到類似的對上海作家的批評，只是措辭婉轉了。如蔚藍的〈海味文學的小家子氣〉中提到海味文學中常出現「花園洋房，高級飯店，名牌老鋪，西餐大菜，家庭派對，風

度教養等等。」^⑩這種趣味與一百多年前的洋場文人十分相似。

以上談的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八十年間，城市平民文化對文人的影響。當然，這些文人是否可被認為是知識精英是可以爭論的，京派學者自然不會承認，但我以為既有海、京派大論戰，至少他們是一種有別於平民的精英。

註釋

① Liu Tsun-yan ed., *Chinese Middle Brow Fiction—From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E. Perry Link, Jr.: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 6.

③ 魏紹昌編：《李伯元研究資料》（上海古籍書店，1980），頁51。

④ 楊治、葉寶燦：《舊上海風雲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114。

⑤⑥ 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1990），頁9；頁2-5。

⑦ 《周作人近作精選》（上海文林書局，1936），頁90-91。

⑧ 李俊國：〈三十年代新派文學思想辨析〉，《中國社會科學》，1988年1期，頁175-84。

⑨ 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58-80.

⑩ 《文學自由談》，1990年3期，頁46-51。

葉曉青 現為澳洲國立大學東亞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正致力於近代上海平民文化的研究。